

# 保存警察打死人证据咋成了“逃亡之旅”

太原讨薪死者工友逃两公里保存警察打死人证据。据讨薪死亡的河南女工周秀云的工友孟林介绍,当时涉事警察王文军一只脚踩着周秀云头发,“零下10多摄氏度天气,他就那么狠心,我用手机录了下来”。警察发现有人拍照,就收了三四部手机,孟林一直向西跑了一两公里,才甩掉了追赶的警察,保存了证据。(1月7日《郑州晚报》)

感谢这位工友。他一路狂奔甩掉警察追赶,保存了警察打死人的证据,为事情真相最终得以曝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现如今,某些单位和某些人为了推卸责任、逃脱问责,不惜置自身的形象和公信力于不顾,你不出证据,他们就不会认错。讨薪女工命丧派出所后,当地相关部门一开始并未立案,且有警察倒

打一耙,称“网络照片的拍摄角度是从当事民警侧后方拍摄,因此产生了脚踩着妇女头发的视觉误差,而且上传者断章取义故意误导广大网民”。还好,当时在场的民众不仅拍下了照片,还拍摄了视频,让那些试图忽悠公众、蒙混过关的说法不攻自破。

真替这位工友感到后怕。可以说,他为了保存证据冒了很大的风险。这绝非危言耸听,近年来,老百姓因拍摄执法被殴的案例频频见诸报端,有人还因此丢了性命(如湖北的魏文华)。北京甚至还发生过“男子旁观执法打电话被误当拍照,10余人对其围殴”这样的奇葩事儿。幸亏这位工友逃得快,幸亏太原警察腿脚不太利索,万一当时被追上了,谁知道会出现啥后果?

保存警察打死人的证据,本不

该成为“逃亡之旅”。法无禁止皆可为,并无哪个法律条文禁止公众拍摄执法。执法行为并不涉及国家机密,无须遮遮掩掩。并且,公民对此进行拍照或摄像,也是对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一种正常监督。只有允许监督、鼓励监督,才能督促相关部门规范行为、确保执法公平公正和公开透明。

为何有人“防火防盗防拍照”,不惜动用武力收缴公民的手机?最根本的原因无非两个:一是他们存在过错,心虚;二是他们试图掩盖问题,逃避责任。查查收缴手机的单位和执法人员,发现问题的可能性很大。同时,这种做法本身也涉嫌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应在今后的执法过程中坚决予以杜绝。

□乔志峰

## @微博郑州

### 微话题

#### 这样的“征婚”你们敢接受吗?

@中原网:身高185cm,职业是国家垄断行业正式职工,收入月薪8000+,年底有奖金,女方买的房其房产证加男方父母名字……“我就是凤凰男,虽然不完美,但我立志创造完美,这样的我,你敢不敢要?”小编看醉了,大家都来发表一下你的看法吧!

### 网友跟帖

@喵wu\_猫小妖:房屋写男方父母名字,让家人觉得有归属感,那么女生父母的归属感怎么体现?  
@扬眉毛的小明:注定要孤单一辈子。

## 院士队伍去行政化能否更彻底

两年一度的两院院士增选工作在1月1日启动,这是自2014年6月两院院士大会修订章程之后的首次院士增选。中国工程院内部人士对记者介绍,年轻化、取消部门遴选、处级以上干部不得成为候选人等规定是此次增选的变化亮点。

(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AA10版)

无论是科学院还是工程院,准确地说都是学术性服务机构,不是“官员俱乐部”。行政的归行政,学术的归学术,只有这样,院士与官员才能各自专注于本职工作。这次制度变革虽说是回归了常识,但由于过去多年没有做到,这次算是不小的进步,值得喝彩。不过,这次去行政化改革还是不够彻底。

根据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办法规定,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党政机关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原则上不作为候选人。中国科学院也有类似规定。这一规定中所指的“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显然是仅限于党政机关,而很多事业单位领导、国企高管的行政级别都在处级以上,但却不在

限制之列。

该不该限制像大学校长、院长、国企董事长这种官员参选院士?可能大家意见不一。一种观点会认为这种官员不是党政官员,不会动用公权力干扰院士评选,也不会加剧院士队伍“行政化”,可以参选院士;而另一种观点会认为,这种官员也有行政级别,本职工作已经很忙,不应该参选院士。

依笔者之见,院士既然是一种最高学术称号,应该让那些专注于学术的人来参选。很显然,大学校长、院长很多精力用在了行政事务性工作方面,即使是学术成就已经很高的校长,有行政职务之后投入学术的精力也是很有限的。而国企高管的主要精力在企业管理和经营方面,也没有多少精力从事学术研究。

所以,理想的院士增选制度应该是,凡是有一定行政职务、行政级别的官员,都应该禁止参选院士。一来,能让院士队伍“去官化”更为彻底;二来,能让这些官员专注于本职工作;三来,能让出很多

名额给那些专注于学术的人当选院士。如果某些校长、董事长更想当院士,应辞掉行政职务参选院士,相信没有异议。

院士队伍去行政化要想更彻底,除了在增选环节限制官员参选院士之外,还应该逐步清理现有院士队伍中的官员和国企高管。尽管没有统计数据,但有院士中有多少“官员院士”,但过去多年每次新增选的院士中都有官员和国企高管,几年前官员所占的比例更高。这就造成院士队伍“官气”太重,影响院士队伍“纯洁”。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这为清理“官员院士”提供了决策依据。笔者以为,凡是到退休年龄的“官员院士”,应该自动退出院士队伍,或者说,主要忙于行政事务的“官员院士”,也应该及时退出院士队伍。这样才会“净化”院士队伍。

□张海英

## 真实的卡壳比彩排的顺溜更具示范价值

1月6日晚,2014年“十个突出问题”承诺整改电视问政“期末考试”如期开考了,在首场作风问政中,武昌区委书记王立当场被要求背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出现了卡壳的情况,好在最后他完整地背出来了。

(1月7日中国新闻网)

揶揄嘲讽之余,其实我们也能从这“卡壳”中找到更多的示范价值。现场的卡壳起码证明了这一场电视问政节目并非事先彩排,按部就班的官员秀,而是真刀实枪的检验与考核。相比于顺溜地背诵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样的真实更显得难能可贵。在我们的官场生态中,充满了经过事先彩排、滴水不漏的夸夸其谈,这样的高谈阔论听起来固然动人,可是建立在非真实基础之上的甜言蜜语更容易变成空头支票,成为应对讨好舆论的障眼法。

我们不缺乏能顺溜背诵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官员,稀有的恰恰是这样的真实、这样的真刀实枪。这样的突然“发难”。再说“卡壳”也并不能说明这名区委书记在实践中就没有很好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些顺溜背诵出来的官员也未必就完美践行了。因而面对这位“卡壳”的区委书记,我们完全不必责备,就算他最后没有背诵出来,我们也应该来点掌声,这掌声是给这位书记的真实,以及这台电视问政节目的真刀实枪,毕竟物以稀为贵。

以包容心态来看待这场真刀实枪电视问政节目的现场真实“卡壳”,收起手中的板砖,一起来呵护这难得的真实与原生态,必将能鼓舞更多的官员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以更加本真的状态面对民众。官员也是普通人,也需要通过外界的认同来找寻自身的定位与价值,一味地嘲讽与质疑,只会让他们迷失在“动辄得咎”的错觉中,进而展现在民众面前的总是经过精心彩排与伪装之后的自己。我想民众需要的也并不是高大全的官员,这样的高大全不接地气,离人民群众太遥远,注定也无法真正了解民意,为民谋利、为民解忧。

□夏熊飞

## 来自“专车”的挑战也有市场转型契机

今年1月起,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将大力打击利用互联网和手机软件从事非法运营的社会车辆。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多个软件提供“专车”服务,实际上就是变相为乘客提供了黑车。这是北京首次公开认定私家车通过打车软件拉活属于非法运营。

(1月7日《北京青年报》)

的士受“专车”冲击,管理部门不得不出面禁止“专车”以维护市场秩序。从“专车”运营服务的安全性来看,这种禁止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这也并非意味着针对此次的士与“专车”之间的冲突,“一禁了之”可以一抓万灵。事实上在的士与“专车”的冲突背后,暴露的恰恰是目前的士市场运营机制的诟病。的士司机承担租子过高,的士运营公司服务跟不上等,都是造成的士运营困难的一个重要方面,“专车”不过是充当了一条市场鲶鱼,进一步倒逼了这一现象。

如何疏解的士运营困难,需要从来自“专车”的挑战中读懂市场精神。“专车”为何更受欢迎?原因有二:一则,一些“专车”高端大气上档次,租赁“专车”出行的乘客,感到倍有面子因而提升了其使用价值;二则,“专车”与滴滴等打车软件的有效结合,加之“专车”本身不需要额外的“租子”又使得乘客出行的成本降低。在这样的背景下,担负着沉重负担的出租车怎能挡住“专车”的进攻?

以此而言,规范市场秩序,虽说叫停“专车”运营可以临时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这种矛盾没有解决,在条件符合的情况下,此次“专车”所触发的出租车市场竞争,仍有可能重新被激活。更何况,在没有打车软件经营“专车”的时代,黑车的纵横依然防不胜防,令出租车司机头痛不已。也就是说,面对这些市场挑战,以行政力量规范与整顿固然是捍卫市场秩序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如果不从根子上

正视出租车问题,厘清背后的需求关系,从市场机制加以创新,即便勉强按下“专车”的“葫芦”也不过是维持了一种表面的平静。

出租车运营最大的问题是,虽有一些公司经营,但事实上没有形成竞争关系。在市场上,出租车的运营更多地呈现某种垄断特征。出租车司机在角色身份上,如同出租车公司的职工,但在财产关系上,他们却是出租车运营成本的直接承担者,不合理的分成关系与落后的公司服务,导致他们即使想要和“专车”来一场竞争,也难以拿出应有的实力。因此,本次“专车”所带来的市场冲击,诚然具备某种灰色性质,但亦是提醒管理者,是时候改变旧有出租车运营机制,通过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力量,减轻出租车的运营成本,从而真正建设一个可靠而有序的出租车服务市场。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